

長江三角洲 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 1350-1988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黃宗智

Philip C.C. Huang

APL856337-3

長江三角洲
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

黃宗智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Kuala Lumpur Singapore Hong Kong Tokyo
Delhi Bombay Calcutta Madras Karachi
Nairobi Dar es Salaam Cape Town
Melbourne Auckland Madrid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990

長江三角洲
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
黃宗智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6517 0 (中文繁體字版)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f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f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中文版序

歷史研究必須聯繫理論，但理論，尤其是政治化了的理論，很容易成為探索歷史真實面貌的障礙。在研究過程中，我一直執着從史實到理論而再回到史實的認識程序，避免美國社會科學為模式而模式的陋習。我力求到最基本的事實中去尋求最重要的概念，再回到事實中去檢驗。對現存各家各派的理論，爭取去誤存真，建模式於實際。在這個基本的方法上，此書與拙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是一致的。

本書的出發點是 30 年代的實地調查資料，尤其是費孝通、林惠海和日本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門對長江三角洲 8 個村莊的研究。這些資料翔實細緻，非一般歷史文獻資料可比。我試圖在這條基綫上，結合江南地區比較豐富的文獻資料，追溯明初以來的一些主要變化。這個研究方法也是與《華北》一書一致的。

與《華北》不同之處在於應用了我自己 1983 至 1985 年在松江縣華陽橋鄉的薛家埭等 6 個自然村的調查，考察了 30 年代至今日的變化。我相信跨越革命前後的這條研究鴻溝會對闡明兩半部分都有幫助。同時，本書着重把江南和華北對照相比。

在華陽橋鄉調查的一切安排，都由南京大學呂作燮教授和松江縣外事辦公室陸放根同志承擔。羅侖教授參加了第一年的調查。嚴學熙和周國偉兩位先生和我方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合作研究工業、民衆集體

活動和政治。陳忠平同志則和顧琳（Linda Grove）合作，研究商業與華陽橋鎮。本書雖然沒有引用他們諸位的調查資料（除了第12章注明的一節之外），但我在認識上和精神上都受惠於協作的諸位同仁許多。我個人的調查，主要在薛家埭等村內進行，採用的是仿效滿鐵在華北調查的方法，每次圍繞幾個預定的題目座談，但也隨時追蹤原定範圍之外的綫索。這樣的調查，關鍵在於虛心和具體的問訊。調查期間，當地前大隊支部書記何勇龍同志對我幫助至多。

我們原計劃要出一部與仁井田陞根據滿鐵在華北的調查所編的資料集（《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相類似的書。全部調查的問答記錄、統計資料、按戶調查以及為出資料集而挑選的各節問答記錄，都由南大呂先生保管。國內出版情況若能改善，這些資料也許有可能發表。

在前人有關江南的大量的研究之中，我得助於吳承明先生的商業研究和徐新吾先生的手工業研究至多，在有關各節都有注明。此外，本書亦受益於我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幾位博士生的研究。正文之中引用了夏明德（Lynda Bell）、武凱芝（Kathy Walker）和葉漢明的博士論文以及程洪、李榮昌和盧漢超的研究論文，都有注明。程、李、盧三位更承擔了此書的翻譯，由程洪統稿。謹此向他們致衷心的感謝。譯稿經我自己兩次校閱，應基本準確。

黃宗智

目錄

中文版序	vii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編 1949 年以前	
第二章 長江三角洲的生態系統	23
第三章 商品化與家庭生產	45
第四章 商品化與經營式農業	62
第五章 商品化與過密型增長	81
第六章 農民與市場	98
第七章 帝國主義、城市發展與農村過密化	122
第八章 兩種類型的村社	153
第二編 1949 年以後	
第九章 舊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造	175
第十章 集體、家庭與副業生產	210
第十一章 農業的增長與發展	234
第十二章 鄉村工業化	267
第十三章 鄉村發展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	282
第十四章 半農半工的村莊	305

目錄

第三編 結語

第十五章 一個總結	323
第十六章 幾點思考	344

附錄 A 長江三角洲 8 個村莊的社會經濟輪廓	355
附錄 B 長江三角洲的人口與耕地面積	357
附錄 C 明清和民國時期上海地區鎮市的形成與演變	361
附錄 D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的農業外就業(1950-1985)	368
附錄 E 華陽橋公社以及中國鄉村總產值構成的變化	380
附錄 F 集體、聯戶和個體企業的收入	384

引用資料

訪問座談	386
約談村民	402
引用書刊目錄	405

附表目錄

正文表

2.1	太湖盆地的旱澇災（901—1900）	35
4.1	長江三角洲 8 個村莊的雇農（1939—1940）	63
4.2	長江三角洲 22 個鄉村的雇農（1949）	65
4.3	河北—山東西北部和長江三角洲的雇農工資 （1929—1933）	69
4.4	直隸、山東、江蘇、浙江以及全中國涉及長工的 命案（1721—1820）	73
5.1	上海縣的糧價（1632-1682）	88
5.2	上海縣的棉價（1621-1684）	88
5.3	蘇州府和松江府的稻米產量（1023-1850）	94
5.4	中國的商品貿易量（約 1840）	96
6.1	華北和長江三角洲 6 個村莊農民出售的主要 商品（1936，1939）	99
6.2	華北 3 個村莊農民購買的商品（1936）	100
6.3	長江三角洲 3 個村莊農民購買的商品（1938）	102
6.4	長江三角洲 3 個村莊農民購買的商品（1939）	103
6.5	華北和長江三角洲 9 個村莊的主要作物 （1936—1939）	104
6.6	華北和長江三角洲 6 個村莊的棉布消費（1936）	105
7.1	米廠村棉花、高粱、玉米、小麥和大麥生產的 單位面積及單位勞動力收入（1937）	132
7.2	中國人均布消費（1840—1936）	146
9.1	土地改革時薛家埭等 6 個村的中農和貧農戶數 （1950・6）	177

附表目錄

9.2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的黨政領導（1956—1985）	189
9.3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各生產隊隊長及其入黨情況 （1956—1985）	190
9.4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記工標準（以年齡和性別 為依據，1983）	193
9.5	華陽橋公社農民口糧月定額（1985）	195
9.6	西里行浜生產隊的主要領導（1956—1984）	199
10.1	華陽橋公社和種籽場大隊的結花 （1968—1985）	221
10.2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人口中務農勞動力的比例 （1965—1984）	222
10.3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的人口和全勞動力 （1964—1987）	223
10.4	松江縣國營商店收購的兔毛（1966—1984）	228
11.1	松江縣及中國主要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 （1952—1987）	237
11.2	松江縣單季稻、早稻、晚稻播種面積 （1949—1984）	239
11.3	松江縣小麥和大麥、棉花、油菜播種面積 （1949—1984）	241
11.4	許步山橋生產隊的工分值（1965—1983）	252
11.5	松江縣及中國主要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 指數（1952—1987）	255
11.6	上海直轄市及中國的化肥應用指數 （1952—1986）	265
12.1	華陽橋公社各企業職工人均資本額、總收入和 工資，及與國營工業企業的比較（1983）	272

13.1	華陽橋公社主要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 (1956—1983)	287
13.2	中國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播種面積百分比 (1952—1986)	298
14.1	江蘇省七縣 190 小城镇人口普查(1985·6·30)	307

附錄表

A.1	長江三角洲的 8 個村莊	356
B.1	松江、蘇州府、太倉州、無錫、江陰縣人口 及耕地面積 (1393—1932)	359
B.2	松江、蘇州府、太倉州、無錫、江陰縣人均 耕地面積 (1393—1932)	360
C.1	上海地區鎮市的發展(1911 年以前及民國時期)	363
C.2	上海地區鎮市的形成(1850 年以前)(總數:69 個)	364
C.3	上海地區鎮市的形成與演變 (1862—1937) (總數: 107)	365
D.1	薛家埭生產隊的農業外就業人員(1950—1985)	368
D.2	許步山橋的農業外就業人員 (1950—1985)	372
D.3	西里行浜生產隊的農業外就業人員(1950—1985)	374
D.4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各生產隊村民的農業外 就業 (按企業劃分) (1950—1985)	376
D.5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各生產隊村民獲得農業外 就業機會的途徑 (1950—1985)	378
D.6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各生產隊村民農業外就業的 性別比例 (1950—1985)	379
E.1	華陽橋公社與全國鄉村的總產值構成的比較 (1971-1986)	381

附表目錄

E. 2	中國鄉村總產值 (1985-1986)	382
E. 3	華陽橋種籽場大隊的總產值 (1977—1984)	383
F. 1	若干地區鄉村各類組織形式的企業的總收入 (1986)	384
F. 2	全國鄉村各類組織形式的企業的總收入 (1984—1986)	385

地圖目錄

1. 1980 年的長江三角洲	25
2. 1820 年的長江三角洲及本書研究的 8 個村莊	26
3. 長江三角洲的地形	27
4. 長江三角洲的稻、棉栽培 (1930)	28
5. 長江三角洲的歷史地理	29
6. 華陽橋薛家埭等 6 個自然村 (松江縣, 1940)	156

第一章 導論

在 1350 至 1950 年長達 6 個世紀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發展過程中，以及在 1950 至 1980 年的 30 年集體化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先進地區長江三角洲的小農農業長期徘徊在餬口的水平。只是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質的發展才真正在長江三角洲農村出現，并使農民的收入相當程度地超過了維持生存的水平。本書旨在探討長江三角洲農民餬口農業長期延續的過程和原因，及其變化的過程和原因。我將着重分析農民的生活狀況，而不是整個經濟的毛收入或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重點在於一個特定地域和社會階層的發展與不發展，及其對中國歷史總體，以及對農民社會和經濟的各派學術理論的意義。

經典理論：斯密和馬克思

亞當·斯密(1723—1790 年)和卡爾·馬克思(1818—1883 年)儘管有着明顯的分歧，卻共同認為商品化會導致小農經濟的質的變化。^①斯密認為，自由的市場競爭和個人致富的追求會導致勞動分工、資本積累、社會變革，乃至隨這些而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馬克思的觀點與此類似，商品經濟的興起會引進資本的時代。

① 當然，斯密沒有用「小農經濟」這個詞，但毫無疑問他認為前資本主義農業是停滯和落後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強行抑制了自由貿易。（斯密 1976 [1775—1776]，特別是 I：401—419，II：182—209）

馬克思進而把小農農業等同於「小」生產，把資本主義等同於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商品經濟的發展會伴隨着以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者與他們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為對立雙方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即使斯密沒有這樣去關注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係，他在相當程度上持有同樣的觀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會導致資本「改進」和規模經濟。（斯密 1976 [1775—1776]，第 1 卷：特別是第 7—16 頁）^①

當然，斯密和馬克思的共識很大程度上基於英國的經驗。小農農場隨着商品化而讓位於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資本主義農場，畢竟是英國圈地運動和 18 世紀農業革命的實際經歷。斯密和馬克思的共識於是在實證之上逐漸形成為人們心目中的一個規範認識（paradigm），似乎達到了毋庸置疑的地步。

甚至革命的俄國和中國也從同樣的認識出發。列寧直接引用馬克思的說法，力主革命前俄國的商品經濟已與農民向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和農村無產者兩極分化同步發展。在列寧看來，無論是俄國，還是在英國，小農經濟只能是停滯的和前商品化的經濟，而商品化只能帶來資本主義發展和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分化。（列寧 1956 [1907]）他的繼任者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化是避免資本主義的社會弊病，同時又使小農經濟現代化的唯一辦法。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能夠解決資本主義分化的問題，而集體化農業能夠把農民的小生產轉化為高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經營。

毛澤東接受了相同的公式和選擇。社會主義的集體化被視作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外的唯一途徑，而對於資本主義

① 雖然斯密曾指出小所有者是具有高度進取心的耕作者（第 441 頁），他的論點並非是小規模農作會比大規模農作更有效率，而是自耕農作會比佃耕農作更具刺激性。（第 418 頁）

和社會主義之外的其他鄉村發展途徑的可能性不加認真的考慮；同時，也沒有考慮餬口性的農業會在商品化或集體化之下持續的可能。（毛澤東 1955a, b）

中國的學術研究

毛時代中國的學術研究為上述的經典模式所支配。「封建經濟」等同於前商品化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等同於商品化的大生產。這一模式的特殊的中國式的結合體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概念。據這一分析，「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發生差不多與近代早期的英國和歐洲同時，要不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打斷了這一進程，中國也會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據此，中國歷史被納入了斯大林主義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交替演進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另一可能的說法是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發展，這觸犯了多數人的愛國感情。）

在上述主要的理論信條下，解放後中國農村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首先關注明清的商業發展，開展了鑒定主要貿易商品以及對其作量性估計的出色研究，尤其着重在那些長途貿易和城鄉貿易的商品，以此考察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把其等同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始於 50 年代的研究成果，在 80 年代終於開始發表。^①

解放後第一代的其他一些學者尋找經典模式預言的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興起。在 50、60 年代的官方政治理論中，生產關係被認為是馬克思提出的人類歷史上一對主要的矛

① 吳承明 1985 是關於清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傑出研究。

盾（「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中的決定性方面。它設想，要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封建」關係能被證實讓位於勞資間的資本主義關係，便可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出現的無可辯駁的證據。出自這一分析框架，對明清雇傭關係的發生整理出了很多實證。（中國人民大學 1967；南京大學 1980）^①

在改革的 80 年代，研究的重點轉向「生產力」的發展，反映了新的政治理論強調生產力，而不是生產關係，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新一代學者開始尋找伴隨着商品化而來的生產率提高的證據。隨着蔓延着的對集體化農業的非議，他們回到他們想到的唯一的替代途徑：市場和資本主義。如果明清時代的商品化真帶來了農業發展，那麼今日的農村也應採用同樣的做法。這一新的學術傾向的突出代表甚至爭辯說：清代長江三角洲總體上的經濟發展超過了「近代早期」的英國。（李伯重 1985a, b, 1984）

關於清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中國學術研究在美國學術界得到了呼應。美國新斯密學派的日益普遍的設想之一堅持說伴隨着清代市場擴展而來的變遷應視作「近代早期」的發展，相當於 16 至 19 世紀英國和西歐的發展階段。這一觀點把中國并入一個通用的現代化模式，而把清史作為中國的「近代早期」史。^②

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有許多值得讚許之處。在我看來，它的成功之處在無可懷疑地證實了 1350 至 1850 年間長江三角洲

① 李文治等 1983 是關於農村雇傭關係擴展的最優秀的學術成果。

② 本書寫作時，關於清代是中國「近代早期」的觀點尚未有人系統說明，主要含蓄地反映在一些著作中，尤其是羅 1984。這個觀點和中國新學術的分歧在於兩者對帝國主義的認識。「近代早期」觀點很容易導致認為帝國主義刺激了進一步商品化和發展。（科大衛 1989；羅斯基 1989）這樣的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觀點當然不能為大多數愛國的中國學者所接受。